

新加坡进入新总理时代 内外政策如何应对挑战

新加坡第四任总理黄循财近日正式宣誓就职。新总理的执政风格如何? 上任后面对哪些任务? 新加坡内外政策是否有变化? 本期论坛请专家解读。

——编者



刘阿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所长、东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



▲ 新加坡民众祝贺新总理上任
▲ 黄循财(左)在宣誓就职仪式上与前总理李显龙握手 图GJ

51岁的黄循财是首位新加坡独立后出生的总理,也是20年来新加坡首位新总理,新加坡正式进入“4G”即第四代领导团队新时代。

新总理务实肯干

新总理的成长经历可谓平民出身和菁英教育背景于一身,并且拥有相当丰富的政府工作经历。1972年,黄循财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家庭,在组屋中长大,成年后领取政府奖学金赴美深造,先后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专业学士、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7年黄循财在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担任经济学家,开始职业生涯,2011年进入政坛,曾在新加坡国防、教育、通信及新闻、国家发展、文化、社区及青年、财政等多部门任职。

2020年黄循财担任新加坡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联合主席,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和沟通能力而声名鹊起,2022年4月被任命为时任总理李显龙的继任者,2个月后晋升为副总理,正式开始为执掌政权作准备。从政以来,黄循财给人留下温和谦虚、务实肯干的印象,展现出比较明显的执政风格。

一是强调国家责任感。“我的每一分精力都将投入到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服务中”,“你们的梦想将会激励我前行”。在就职演说中,黄循财承诺将尽全力肩负起新任务,与团队为人民和国家竭尽所能,并呼吁所有新加坡人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领导。我们将继续大胆追梦、深谋远计。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新加坡故事的最佳篇章就在前方。”

二是平易近人的亲民风格。“造福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是黄循财的社会愿景,他倡导成立国家青年基金、为国民提供运动补贴、免除国家博物馆门票等,办成了若干惠及民生的实事。任副总理后,以他为首的政府团队推出“新加坡携手前进”活动,加强政府高层

与普通民众在关乎新加坡未来的重要议题上互动,让政府政策有更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是注重团结和传承。黄循财具备深厚的公务员背景,深知稳定、团结的执政团队的重要性。确保权力交接平稳顺利,减少任何可能的变数,是他对内阁人事安排的主要考虑。新内阁名单中只有两张新面孔,黄循财继续掌管财政部,在疫情期间与他并肩战斗的65岁的颜金勇升任副总理后继续管理贸工部,63岁的副总理王瑞杰也继续担任原职,展现施政团队的稳定和连续。

多重挑战不轻松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政权交接过程一直非常顺利。但相比李显龙在接任最高职务之前已担任副总理长达14年,黄循财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2年,而他面临的挑战并不轻松。

一、如何改善民生、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创造了令人艳羡的经济奇迹。高位接盘的黄循财虽然享有前辈留下来的良好发展基础,但也有不小的压力。疫情之后,新加坡经济恢复较快,展现出强大的“吸金”能力,但同时生活成本激增,房价屡创新高,社会流动性下降,人口老龄化严重,贫富收入差距拉大,移民劳工带来的社会问题屡屡出现,这些都亟需政府出良策应对。

二、如何应对一个政治诉求更多元的社会。近年来新加坡反对党不断壮大,在2020年国会选举时夺下建国以来最多席位,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则因罕见的腐败丑闻而受到震动。作为党领袖,黄循财将领军出战最迟于2025年1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肩负着提升国民对执政党的满意度、扭转上届大选得票率下滑态势的政治重任,国内外都希望藉此次

大选看到新政府的政治实力。

三、在地缘政治激荡中为国家掌舵。“新加坡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离不开地区和平与稳定,新加坡对地区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异常敏感,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世界显然不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相比过去20年,当前新加坡面临的巨大变化是地缘政治形势的激变。在就职演说中,黄循财指出,新加坡作为多元开放的小国,无法摆脱大国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日益普遍和猖獗的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必须加强国家认同感和互信,才能应对内忧外患。

传帮带政治传统

建国近60年的新加坡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治理模式,黄循财治下的新加坡在政策大方向上不会有太大改变,可预期、可持续性的内政外交政策将是新政府施政的最大特点。

新加坡内阁设有国务资政一职,“国父”李光耀曾以此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和咨询长达21年,第二任总理吴作栋2004年完成权力交接后担任国务资政至2011年,有着整整20年执政经验的李显龙也继续担任国务资政一职。这种传帮带的政治传统决定了新政府的各项政策延续大于变化,传承大于创新。

然而,延续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黄循财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接任总理,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转变,应变是新政府无法回避的必答题。2024年1月新加坡决定提高消费税,用该笔资金照顾正在增长的老年人口和满足医疗保健支出。今后,这种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还将出现。

外交上,新政府有两个重点,一是在大国间保持中立平衡,二是重视东盟的中心地位。大国平衡外交是新加坡在国际上立足的

原则,也是作为小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生存之道。一方面,新加坡将继续秉承对华友好政策。新加坡和中国在涉及重大国家安全利益方面不存在矛盾,2023年黄循财两度访华,高度赞扬两国合作的丰硕成果,表示愿同中国一道,以两国关系定位为指引,高质量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打造国与国合作典范。2023年12月,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协定最终达成。2024年2月,两国实施签证互免。另一方面,新加坡将继续做美国的“好伙伴”。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新加坡也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安全合作伙伴,两国在气候变化、太空、新兴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不断加强。

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新加坡一贯将东盟视为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依托。在面临大国博弈和地区自身政治与经济事务纠葛的当下,东盟的重要性更是无可替代。它不仅保护东南亚地区小国免于沦为大国的战略附庸,而且为它们在地区事务、国家发展中赢得自主权和大国的尊重。因此,新加坡支持东盟加强韧性和团结性来抵御外部压力,并将继续推动东盟在地区治理中发挥中心性作用和实际功能。

最近民调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黄循财很有能力,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强有力的领导者,近40%表示他看起来值得信赖。这一比例在“Z世代”受访者中明显更高,近五分之一的人对他的任命充满希望。

多变的国际局势不允许新加坡故步自封,新总理需要时间突显执政风格,应对国内外挑战。如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进一步改善民生,在动荡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中保护国家利益,带领新加坡在变局中继续谋发展,是年富力强的新总理必须面临的“大考”。



斯洛伐克总理遇刺背后,欧洲政治极化加剧



简军波
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复旦大学中关系研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本国民众刺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可以说,菲佐遇刺事件是斯洛伐克国内社会分裂因素长期发酵的结果,也是欧洲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的体现。如果不能解决相关挑战,欧洲政治极化现象只怕还会持续下去,深刻改变欧洲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轨迹。

斯洛伐克社会分裂明显

关于行刺菲佐的具体动机尚不

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菲佐的政治立场和施政方案相关。

菲佐在斯洛伐克政坛叱咤风云几十年,如今“梅开四度”,第四次担任总理。整体而言,作为左翼政党领袖,他的政策被欧洲主流观念视作民粹主义。在如何对待媒体、反腐和俄乌冲突等议题上,斯洛伐克从朝野到庙堂,不同群体间的裂痕非常明显。

然而,刺杀事件不仅是斯洛伐克政治极化的结果,也正成为扩大政治极化的要素。它正引发斯洛伐克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相互攻讦,执政党认为是反对党在民众中挑拨离间引发对菲佐的仇恨,反对党则认为执政党的民粹主义政策促使社会内部裂痕不断加大。

欧洲民粹主义力量崛起

一叶而知秋。斯洛伐克作为欧

盟成员,其国内政治极化并非个例,欧盟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极化同样普遍,并有着类似的社会根源,通常以民粹主义面貌呈现,尤其表现为极右翼政党的得势。

目前来看,过去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极右翼政党开始在欧洲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威胁甚至取代传统执政党地位。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来自极右翼的兄弟党,瑞典极右翼政党民民主党也获得了执政机会,芬兰极右翼已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荷兰自由党在获得议会多数后距执政只有一步之遥,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和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等极右翼政党,都已成为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或深刻影响政策走向的政党力量。

受以极右翼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高度挤压,传统的温和中左翼和

中右翼为赢取选民不得不向民粹主义靠拢,实际上又增加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吸引力。如今除马耳他、瑞士等极少数国家外,西欧国家政治极化几乎都在加剧。在中东欧,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更是典型代表。

经济发展不佳,传统政党自身危机,欧洲文化无法应对移民、身份认同、治安等社会挑战,通常被视为欧洲政治极化的几大原因。

不管怎样,传统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失能显然是民粹主义力量迅速崛起的原因,而民粹主义力量对欧洲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势必引发欧洲社会内部急剧的观念冲突和群体分化,继而又传导到政治生态中,使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欧洲议会选举不容乐观

将于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将“评估”欧洲政治极化的影响力。

现有的民意调查结果不令人乐观。据预测,欧洲议会的中间派党团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团、中左翼的社会党与民主党党团、自由党组成的复兴党团将保留多数席位,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少的多数席位,而极右翼党团席位将会大幅扩张。因此,欧洲的政治极化将在今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新的展现。鉴于欧洲议会在欧盟中的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将使欧盟和欧洲的政治极化进一步扩大。

最为关键的是,如果导致欧洲政治极化的社会根源不能消除,政治极化一定会继续在欧洲蔓延,并可能引发更多突发事件。

欧洲所有政治家和整个社会需要从斯洛伐克总理遇刺案件中得到警醒,从而更为严肃地共同思考欧洲的未来。